

李 伟 著

National Livelihood Problems: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SJWVT

中华文明为何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中国经济为何在过去30年里持续高速增长？这两个问题，貌似无涉，实有关联。本书目的，是要阐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人千百年来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就是如何生存下去的基本生计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梁启超将经济学译作生计学，自有根据……

國人生計問題

——源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另类思考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National Livelihood Problems: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國人生計問題

——源于中国人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另類思考

李 伟 著



中國經濟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人生计问题：源于中国人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另类思考/李伟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3

ISBN 978 - 7 - 5017 - 9553 - 6

I. 国… II. 李…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②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5154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郭国玺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553 - 6/F · 8394

定 价 45.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 CONTENTS

开篇问	中国经济学在哪里？	1
第一章	中国与西方：方法与思想史考察	5
一、	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	5
二、	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8
三、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权	10
四、	回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	13
五、“经济人”与国人		16
六、	上古时代的“国人”与“野人”	19
七、	古代经济思想（一）：务农、食货与人民谋生之道	21
八、	古代经济思想（二）：田制、地权与恒产恒心之说	24
九、	古代经济思想（三）：义利、财富与大同理想之论	26
十、	古代经济思想（四）：分业、编户齐民与人口理论	31
十一、	古代经济思想（五）：节用、侈靡与货币理论	35
十二、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在抵抗中嬗变	38
十三、	重新审视蒋介石的《中国经济学说》	43
十四、	特别推崇费孝通乡土中国社会经济研究	48
十五、	为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鼓与呼	52
第二章	人生如梦：中国人的个人生计	57
一、	生出来容易，活下去艰难	57
二、	吃饭是头等大事	61



三、从吃喝有余到穿着得体	64
四、安居才能乐业	68
五、出行要安全、方便和快捷	71
六、土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75
七、受教育是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	79
八、职业生涯: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和选择	84
九、熟人社会中“爱有差等”的行为方式	87
十、差序格局中的“泛均衡”交换关系	91
十一、跨越熟人社会后的角色变换(从关系到经济人)	95
十二、小世界理论:人与人的六重联结(从经济人到关联人)	99
十三、生命成本流逝与个人生计二重性	104
十四、中国人一生的人力资本积累	108
十五、人生境界:从安身立命到“三不朽”再到五种人	112
十六、转眼就是百年:回归乡土大地之根	117

第三章 富不过三代:农耕家庭、家族与村落的生计困境

121

一、婚姻家庭:一个人力资本产权交易的长期合约	121
二、农业的家庭经营效率与家庭财产的缓慢积累	125
三、家庭手工业及其他兼业经营与农家生计	129
四、人口生产:天伦之乐、更多的责任与紧张	132
五、分家析产:长期合约在代际传承中裂变	137
六、富不过三代:家庭内部的紧张与外部压力的共同制约	142
七、家庭财产的产权边界:模糊还是清晰?	148
八、从夫妻双系的家庭到父系偏重的家族	152
九、家族的经济功能:族田经营、祭祀与人才培养	155
十、家族企业的兴衰:与交易费用有关吗?	159
十一、从血脉到地缘:定居之家族聚居为地缘之村落	163
十二、农耕村落共同体:以聚居地为中心向周边不断扩张	167
十三、共同体内部的紧张与向外扩张面临资源有限	170

十四、“三农”的生存困境及不断逼近的生态灾难	174
十五、村落共同体在困境中挤压出“流民”:两种类型	179
十六、村落转型的命运:工业化、城市化和自生自灭	183
第四章 盛不过三朝:中国人“天下”之国民生计	189
一、古代农耕文明的兴起:与 400 毫米等降雨线有关吗? ...	189
二、西周封建立国与“大”农业耕作	194
三、文明中心向周边迂回推进:中原王朝成为华夏中央帝国	199
四、中央集权的政治与小农家庭经营的普遍化	204
五、城乡手工业与市场:夹在官府与小农之间	208
六、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自耕、租佃与细碎化的长期趋势 ...	212
七、流民不断溢出与周期性的社会内乱(农民起义)	217
八、人祸大于天灾: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重创小农经济	221
九、从乱到治和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	227
十、历史上王朝“盛世”跨不过三朝皇帝,盛极而衰	232
十一、秦汉以降中华文明在分分合合中进退延续	236
十二、对外族人口与文化的包容、解构与同化	241
十三、人口迁移的渐进波浪式与中国人“天下”版图之伸缩	246
十四、国民经济重心在动乱与治平中向东向南缓慢推移	250
十五、中国社会大历史:扩张、沉沦、动乱、倒退、回生 之循环及走出去	254
十六、看不懂的中国与中国人:永远的渐进式	258
第五章 重新解释世界:当前生计问题与未来之趋向	265
一、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已经改变世界	265
二、20 世纪中国之大变局:过程与评价	270
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西方的几个“论、题”	274
四、中国经济奇迹的政治前提、粮食基础和文化因素	277
五、经济增长要素(一):金钱与资本投入	280



六、经济增长要素(二):人口与人力资源	285
七、经济增长要素(三):土地有效利用及资本化趋势	289
八、经济增长相关因素(一):组织(合约)与制度成本降低 ...	295
九、经济增长相关因素(二):“中性”政府成为增长的 推动力量	301
十、经济增长相关因素(三):两个市场合为增长的拉动力量	305
十一、关键在人:人力资本总量巨大,国人行为高度一致	309
十二、乐极生悲:快速增长下国人生计面临五大问题	318
十三、一个设想:市场引导非农产业家庭经营之新趋向	323
十四、一个主题:从个人产权界定到家庭财产权的重新构建	329
十五、国人生计之未来:走向“天、地、人”和谐的理想 社会与内心世界	334
结束语 通向东方人本主义——经济学之路或在这里	341

开篇问

中国经济学在哪里？

所谓中国经济学，应当是立足于中国大地，以中国人为对象，通过对中国人谋取生计之经济行为的研究，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说。

——作者

在当今中国大地上，到底有没有“中国经济学”？如果有，在哪里？

可能有人会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大胆，便是无知。在中国内地的四川成都市，高小勇等人不仅办了《经济学消息报》，早在 11 年前（1998 年）就面对面采访过近 20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在 4 年前（2005 年）还强力、刻意地推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五大本文集。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在中国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并且，经济学分析方法以“帝国主义”行径侵占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众多领域。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似乎都具备有“无知无畏的疯狂”^①。

不过，在两三年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访谈时宣称，当今中国真正意义上“够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人，而“够格”的标准却是在英美等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② 这离了中

① 高小勇：《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② 曲力秋：《谁是中国五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N]。中国青年报，2005-11-9。



国大地十万八千里,岂非咄咄怪事?看来,在中国,要被世人承认为“经济学家”还真不容易,哪来的那么多“疯狂”!

70多年前的1937年,上海复旦大学的夏炎德先生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一书中,就“中国经济学”有一段评述:“溯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时间不可谓太短,而检讨过去,果有博通各国各家思想,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而自成一体系之经济学乎?曰:蔑有也。”“还观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臬,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此余对于中国现行经济学未能满意也。”“我国经济学界之著作,目前因未脱除先进国影响,而达于创造时期。”^①

70多年后的今天,上述情况又改善了多少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已转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学科,中国学生学经济抱着经世济民的目的。……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为起点,斯密探讨一个国家怎么富强起来。因此,中国学生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问题是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适用。任何经济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是真理……”^②在林毅夫看来,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问题,即真正能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还有待于国人的努力!^③

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则十分强调经济学的民族特色:“不论过去和现在,凡有影响的经济学说,都是应各国实际需要而发生,没有社会呼唤背景的经济学是没有的。……有13亿人口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只有中国人的智慧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中国经济问题,就应当有对症下药的中国经济学。”“任何国家的经济学,自古以来都是为研究和解决本国经济问题而立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理所当然也应以中国经济为对象,凡提出的理论能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给人民福祉的就是优秀的理论。……我们不能放弃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努力。”^④

① 夏炎德. 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87、190.

② 林毅夫. 西天取经与中国经济学[J]. 经济学消息报,2006-5-12.

③ 林毅夫. 论经济学方法——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J]. 经济研究,1995(10).

④ 胡培兆. 经济学本质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61~64、83~84.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经济学界业内人看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并真正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代表作是否存在,大有疑问!在这里,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经济学?其基本定义要做怎样的描述?

笔者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应当是立足于中国大地,以中国人为对象,通过对中国人谋取生计之经济行为的研究,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说。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的学问,应当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有较强的解释力,必然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一定的渊源。同时,还要借用西方古典与现代经济学某些有效的分析方法,将其有人类共性的某些观点化为中国本土的理念,综合不同学科的某些最新思维,对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发展做出新的经济解释。

假如人们同意上述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义,那么,像这样一种经济学说,在中国大地上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在哪里?可能要费一翻工夫去寻找。

显然,从较为广泛意义上说,近代以来,凡探求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都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学。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还有待于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还是古典的,或前苏联传递过来的,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承,虽然在不同时期能够显赫一时,但都不足以表明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已经有了标志性的理论思维和成果,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的代表作。至于北京天则研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选编的论文集,虽冠以“中国经济学”之名,但只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国国内经济理论界的某些研究状况,尤其偏重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国内的运用成果,并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就是2008年中国经济学界评选改革开放30年创新性理论成果时,只是评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①因此,如果在中国大地上要寻找“中国经济学”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作,结果会发现:它既不在中国的大专院校里,亦不在政府和民间各类研究机构里,更不在已出版的书籍报刊等平面媒体里;或许可以说,它只存在于中国经济学家们仍在努力探求的艰难过程之中!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4日9版,11月30日2版

第一章

中国与西方：方法与思想史考察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王国维纪念碑碑铭》

一、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

既然中国经济学有待于中国经济学家们去努力建立,那么,与这种努力相关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后,为什么不能用来直接解释或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呢?在这里需要先搞清楚,西方经济学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对中国的历史进程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解释或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最后的结果到底怎样?

西方经济学是在 19 世纪末叶,伴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尾声而进入中国的。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半文半言形式翻译过来、定名为《原富》的严复,最先将亚当·斯密这一著作引进到中国来。现在可见的最早版本是



1901年刊行的。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少数留学西洋或对西方有所了解的如马建忠、陈炽等人,断断续续地介绍或表述过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但都不系统。严复的译本《原富》出版后看过的人并不多,能看懂的人更没几个。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又有郭大力、王亚南以《国富论》为名的译本出版发行,这个译本则影响比较大。

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西方经济学大举进入中国的年代。这种进入,并非是西方经济学者对中国的主动输入或曰“侵入”,而是中国学者主动“进口”西方经济学。其中,重要推手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最近有人论证,梁任公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①。的确,在1902年写作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中,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作了通俗的宣传,介绍“重商主义”、“斯密亚丹学说”,等等。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那些年里,为了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进行论战,充分利用他能找到的西方或日本的经济理论为根据来加强自己的改良派观点,写了一系列经济学论文,后收入《饮冰室文集》十卷中。其中,的确不乏许多“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梁启超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把严复译本《原富》中大量晦涩难懂的术语通俗化了,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有了比较现代的话语表达方式。

与此同时,20世纪之初的清政府,被迫对内作了某些改革,如废除科举制度、兴办若干高等院校;西方教会人士也纷纷举办教会高等学校,这些高校先后都把西方经济学列为学习课程之一,逐渐把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系统化和普遍化了。当然,西方经济学在这个时代被中国学者“引进”,基本上还是一些常识性的,属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类的东西,并且翻译水平也比较差。辛亥革命前后,又有较多的留学生从北美和西欧返国,带回了一些较新的或第一手的西方经济学说。

从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到1949年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8年间,西方经济学主要从两大方向进入中国:一是从欧美方向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差不多占据了中国的城市、高校和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其中又以奥地

^① 刁仁德:《经济学消息报》,2007-9-21(7)。

利学派经济学为主要代表。1923年成立的“中国经济学社”，就是中国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刘大钧、北京大学马寅初等为其代表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知名人物胡适也参加过该社活动。^①二是受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影响，也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来。早期有朱执信先生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介绍，后来在一些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提到马克思经济学。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郭大力、王亚南、郭沫若、沈志远等学者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从而达到一个高潮。但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占据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进入中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影响并不大，主要是停留在学校或学术界的“象牙塔”里。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垮台，西方经济学失去了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的原因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使其发挥作用的基础。首先，西方经济学发挥作用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不存在。不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北伐之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一直处在战乱当中，尤其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更谈不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发挥作用的**政治稳定前提**。其次，西方经济学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也不存在。作为一个战乱中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在贫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与“资本”、“财富”、“自由竞争”等相距太远，而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才谈得上其他。再次，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发挥作用的**经济实业基础**也不具备。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外国资本进入，与国民党政权发展民族资本工业的要求发生矛盾，先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节制资本”，而后为了各种战争之需要，把城乡经济纳入战时统制经济的管辖之下，哪里还谈得上“自由市场之竞争制度”的建立。最后，即使是在中国当时的学术思想界，面对中国当时的情况，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西方经济学说作为“洋经济学”，实与中国国情不甚适合，不论是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还是十分活跃的马克思经济学派，在当时的中国似乎都没有其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

① 胡培兆：《经济学本质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69。



二、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自然地将马克思经济学奉为指导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他经典著作,并未详细说明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之后,要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简单地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剥夺剥夺者,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等。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直接从《资本论》中找到指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和办法,只好求助于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老大哥”。因此,苏联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占据了显赫的主流地位。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最初几年,因在战后废墟上恢复重建国民经济的基本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急于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以比较稳妥的方式在全国城乡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政策,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在几年内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20 世纪 30 年代)最好水平时,却发生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不仅想一举实现全国城乡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体化,推行苏联模式的全社会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越苏联模式,甚至提出在主要工业品、农产品方面“超英赶美”,想当然地鼓吹“一天等于二十年”,到处砸锅砍树大炼钢铁、不计劳动报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热火朝天”地违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结果却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出现全局性的 3 年困难时期。1962 年开始全力恢复国民经济,但好景不长,很快又陷入“十年内乱”的困境,国民经济倒退到“崩溃”的边缘。

回顾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数十年的实践,即使撇开“大跃进”和“十年内乱”两次大的失误不说,仅仅从几大基本理论运用到实践的效果来分析,人们不难发现,这一实践至少是不成功的。

其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实践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即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所有制。中国共产党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确实是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理论,借鉴苏联的某些经验,照顾到中国的

实际情况,进行了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从所有制变革的实践效果来看:第一,所有制无论怎样变,都无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公社的失败和保留在农民手中的“自留地”的兴旺,恰恰证明了在一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农耕文明基础上,建立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单一公有制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城市工业及矿产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践效果表明,经济运行本身缺乏效率和灵活性,不论国家的经济管理者费了多大的精力,反复制订许多复杂和难以执行的管理规定,却无法真正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产品质量差、数量少,投入产出几十年一贯制,消耗与浪费惊人。第三,城乡所有制关系变革实践的直接结果,是全社会陷入“短缺经济”状态,一方面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另一方面党政官员则权力膨胀,享受特殊待遇,人民群众与官僚体制的矛盾在“公有制”下令人尴尬地愈演愈烈。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运行的成本极其昂贵,代价实在是太大。

其二,从全社会计划经济实践来看。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强调全社会实行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是前苏联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变异实践中产生的“斯大林模式”,企图将整个社会当做一个大工厂纳入一个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当中,但事实上又行不通,只好保留在“全民”与“集体”之间以及个人消费品的需求上,存在一定的商品交换及市场因素。事实上,从中国大陆几十年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来看,市场因素始终没有完全消除,只是在十分短暂的“大跃进”时期,好像要把指令性计划纳入全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但很快就搞不下去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任何社会每天的经济运行都在千变万化,不可能有全能国家机构来事先知道并规定这些变化,而变化的信息也不是国家机构能充分掌握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何况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更谈不上由国家这种貌似“全能”的机构来事先“计划”了。只有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才能较好地满足千百万独立经济体的选择需要。指令性计划在实践中节节败退,到现在只保留预测性的“规划”,“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改委”,“五年计划”变更为“五年规划”。实践的结果证明,把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纳入统一的计划体制,根本办不到。

其三,从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实践来看。按劳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很不



理想的：首先，每个人不可能仅满足于对生活资料的消费需求，他或她还有投资需求，希望获得除劳动报酬之外的其他报酬。正如东南沿海许多地区的地下私营经济和个人创收，以及全国各地广大农村暗地里的“包产到户”，以增加个人收益的行为，等等，长期都禁止不了，就是明证。其次，即使从按劳分配本身来看，劳动者个人在工作中的劳动量，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是很不相同的，事实上无法准确计量。如果按照个人的劳动能力来给付，个人之间能力不同可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很大的不平等，尤其是有能力而在工作不出力，又怎样计算和给付呢？再次，长时期平均化的个人分配，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各种制度和办法始终都无法把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发掘出来，结果对劳动的监督和计量费时费力，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成本实在太高。最后，多年来实行个人低收入分配的结果，不仅导致劳动力素质提高缓慢，劳动者不愿意用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而且还因收入太低，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一旦出现前述两大失误的状况，相当多的普通劳动者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 总之，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时间，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实践，是扭曲、变异的，即使在正常状态下也是不成功的。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不下去，非改不可。

三、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权

1978年年底的“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如今已走过30年的历程。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从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角度来看，很容易把这一状况单纯地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容易引起党内不同思想倾向的争论和斗争，而且一旦把握不好，就会引起社会上或体制外的政治动荡。

在政治体制改革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农村改革于20世纪80年代头几年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不仅一举摆脱了多年来困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粮食供应紧张状态，而且大大增加了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收入，从而促进了城市轻工业产品产销的迅速提高。农村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